

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武汉大学、郧阳博物馆、十堰市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陆成秋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遗址因发现两具约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而闻名，是一处出土丰富古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和石制品遗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揭露出了该遗址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

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创造条件，2021年起，对遗址开展新一轮多学科考古发掘与研究。

2022年5月18日，距“郧县人”1号头骨化石发现33年之后，在33米远的考古发掘探方壁上，“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面世。“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出露部分保存完好，形态清晰，没有发生明显变形，所能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两具头骨更丰富而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具头骨变形的缺憾。12月3日，经考古团队半年多的精细发掘，“郧县人”3号头骨被顺利提取出土，进入室内清理和研究环节。

“郧县人”3号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



郧县人3号头骨

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关键环节上，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考古学证据。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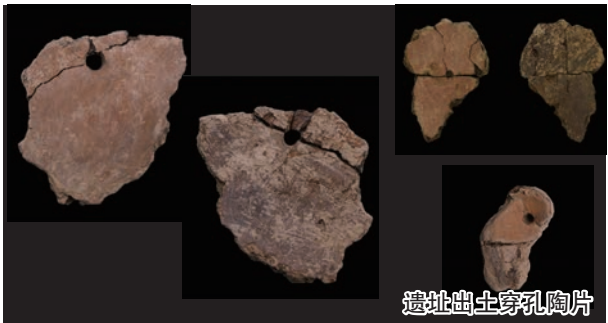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赵益超

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地，位于山东临淄东部，南距淄河1.2公里，东距后李遗址4.2公里，属于鲁中泰沂山地向鲁北冲积平原过渡地带。

遗址距今1.1~1.5万年，处于淄河冲积扇前缘，发现大范围、多频次红烧土遗存，其中一处为距今1.32万年的保存完整的古人类活动营地。该营地总面积约400平方米，有火塘3处，呈品字形分布。围绕火塘发现遗物1000余件，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

遗址出土了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陶器，出土的大量早期陶片遗存充分反映了该时期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为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该遗址还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陶塑，展现了先民对客观世界的体认。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是华北地区乃至东北亚旧-新过渡阶段的重要考古发现。

遗址年代明确，所处节点关键，为复原鲁北地区山前冲积扇的形成过程及古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淄河冲积扇堆积过程中的红烧土为该阶段世界范围内所仅见，是人类用火进



遗址出土穿孔陶片

行景观管理的重要证据，反映了古人从适应自然走向改造自然的重要跨越，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拓宽了学界对于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认知，深刻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山西大学
项目负责人：张光祥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东距兴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神木石峁遗址51公里，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及二里头时代早期，绝对年代2200BC~1700BC。

近十年工作表明，该遗址呈现出从入黄河口处不断向东部主梁发展的趋势，但聚落核心始终是处于遗址中部的小玉梁地点。龙山晚期之初(2200BC)，小玉梁地点兴建了一批南向房址及带墩台的多道门址；2100BC，随着小玉梁南向房址调整为西向的带围墙建筑，并在距此约1公里的东部建造了外城墙及东城门，该聚落也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具有内外双重城垣，面积达75万平方米的大型石城聚落；到1900BC，东门址城门功能的丧失，该石城也进入衰落期。

该遗址的发现首次系统揭示了龙山时期北方石城核心区建筑布局，展现了较为明确的中轴及对称设计理念。碧村东门址的双瓮城结构，是目前所见新石器时代布局最为规整、结构最为严密的一座门址，开创后世双瓮城设计的先河，也为早期城门复原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该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



东门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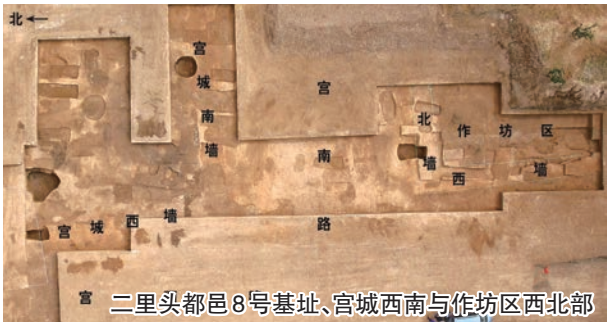
现规模最大的的一座史前城址，属于黄河东岸2000BC前后的区域中之一，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在时空上遥相呼应。而城址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谨慎布防的结构，彰显了浓厚防御色彩，展现了特殊的战略支点作用，这为解读晋陕黄河两岸地区的政治结构和文明形态提供了关键材料。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赵海涛

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为多网格式布局。

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道路向西延伸440米以上，都超过宫殿区295米的東西宽度，道路两侧均有与宫城城墙平行或成一直线的墙垣，因此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的东西方向上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发现宫殿区东、西侧道路向北延伸200、300余米，道路两侧均有与宫城城墙平行或成一直线的墙垣。在距离宫城北侧东西向道路北侧的墙垣以北330米左右处，发现南北宽逾10余米的東西向道路。在距离宫城东墙以东270米左右处，发现东宽逾10余米的南北向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因此，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东的东西方向上至少各存在两个分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和它们两侧的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为分层规划、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群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都邑8号基址、宫城西南与作坊区西北部

首次发现疑似制漆作坊，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现场，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祭祀区以西网格式，发现有贵族居住的夯土建筑和多层级墓葬，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盛行“居群合一”的布局形态。二里头都邑严格方正的规划制度，“居群合一”的布局形态，和其他制度共同体现了二里头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也为先秦时期其他城址探索布局提供了有益参考。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牛世山

2021年启动的以商王陵为核心的洹河北岸地区考古，工作目的首先是通过大规模勘探，结合小面积发掘，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是摸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摸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通过近两年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1.探明并确认两个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商王陵区规模从原来的10万平方米扩展到16万平方米。围沟为商王陵区的障壕。以往考古发现所见凤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墓周围有障壕，殷墟王陵区陵墓障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2.勘探找到了南北向干道的路沟及两个路口，年代早于战国时期，推测为商代晚期的大邑商都的干道之一。3.探明和发掘祭祀坑有新特点，大半以人与狗的组合坑为主，骨骼完整的多，部分坑埋藏器物，这为以往少见，年代明确，为武丁时期。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资料。4.探明并



东围沟G1南段第三地点探方西壁剖面

确认王陵区西南部一带的西周遗址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西周遗址。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5.王陵区东、南方向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区；王陵区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庄南地宽达百米的沙土带，改变了殷墟遗址的景观。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发掘单位：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豆海锋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突破，该遗址不仅发现了一座面积约80万平方米的西周城址，而且在城外发现围沟墓地及大型高等级墓葬，目前已见甲字形墓葬超过20座，其等级如此之高，数量之多在国内均属罕见。

西头遗址所见西周城址功能结构完备，已发现的道路、储水设施、夯土建筑、冶铜遗存等揭示了聚落内的功能区分，特别是冶铜遗存为同时期其他遗址少见，发现大量西周时期陶瓦充分显示了聚落的高等级特征。城外发现储粮遗存显示了聚落规模及社会分配特征。西周城址的发现为西周城邑及西周王朝对泾河流域的控制方式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的闭合围沟墓地以往少有见到，为商周墓葬制度增添了新材料；围沟内发现不同等级墓葬，其中大型墓和中型墓见有殉人、腰坑等商文化墓葬的因素，特别是M90墓道分层、成排殉人38具，整个墓葬殉人43具，为西周墓葬少见。围沟内墓葬随葬品来源多元，充分体现了多人群融合态势，是该区域多族群融合与发展的重要见证。围沟墓地外侧发现大型高等级墓葬群，并以小型围沟将甲字形大墓在空间区分开来，这种



2022年西头遗址斜削地点发掘全景

特殊的“兆域”现象，为揭示人群差异及商周墓葬制度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新材料。

商周时期的泾河中游是历史文献记载的“豳”地，周人早期在该地域有较长时间的活动。西头遗址的发现，为探寻“豳”地所在提供了研究基点，也为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契机。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周必素

共清理发掘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墓葬2192座。其中两晋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以石室墓为主，隋唐时期出土土坑墓，分布分散，三两成群，墓向不一，为小聚集体家族墓地。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包括土坑墓和石室墓两类，主要密集分布于坟坝顶，为公共大墓地。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材质和种类均很丰富，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价值意义：1.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完整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南朝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2.各时期丰富的出土器物，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文化面貌，描绘了西南边疆古代民族1400年的历史画卷。3.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的进程，以及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4.是贵云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丰富、文化因素最复杂的南朝时期墓葬，反映了该时期“汉夷边界”东移到了黔中地区一带。5.从早期家族墓



坟坝顶墓群出土玻璃制品(明)

地到晚期公共墓地的发展及其独特地域文化的稳定传承，反映了中央对该区域进行郡县制、羁縻土司制度的有效管理，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6.浓郁的地域特色，同时见有中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两广、域外等文化因素，反映了该地区的对外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生动案例。

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庙址

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解峰

古城村寺庙址由1号寺、2号寺组成，二者相距200余米。1号寺建筑遗迹遭破坏，仅发现火炕1处、墙体基槽4段、磉墩3个，均为建筑地面以下部分残迹。在晚期地层堆积、现代坑中发现大量遗物，其中，“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的纹饰、制法均与辽宁北票金岭寺出土三燕时期瓦件相同，推测“壬子年”为472年的可能性较大；并出土大量带有北朝晚期中原地区造像风格的小型石造像残片，其中一件背面有北周“建德”年号；出土的“倒心形”莲纹瓦当与渤海国中晚期都城出土瓦当相同。推测佛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属于高句丽时期佛寺；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中晚期。

2号寺共发现8处建筑台基，1处窖穴。南北中轴线自南向北分别营建佛塔、佛殿、讲堂、轴线东、西两侧营建禅房等设施。佛殿堂基夯土中发现舍利地宫，地宫内石函中发现铁函，铁函内发现各类材质质遗物3555件，其中1件金瓶内发现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建筑废弃堆积中出土各类瓦件130余吨，均为渤海国中晚期遗物。并出土大量大型佛造像残片、



古城村2号寺庙址一号建筑航拍片(东北-西南)

小型石造像残片及少量三彩器残片等遗物。建筑破坏面上发现早期磉墩，遗址西侧发现早于前述建筑的墙体基槽，台基夯土中发现渤海国早期瓦片等遗物。根据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2号寺始建不晚于渤海国早期，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中晚期。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刘海旺

州桥遗址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于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截至2022年底，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考古共完成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遗迹117处，种类包括河道、水工设施、桥梁、道路、神庙等。宋代汴河河道、堤岸特征明显，金代河道开始淤塞，可见元代遗留“狭河木岸”工程，明代之后河道开始逐渐被侵占、收窄，明末汴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明代州桥结构基本完整，青石铺筑桥面，砖砌拱券，石砌桥台；汴河南北两岸宋代石壁上雕刻有海马、仙鹤、祥云等浮雕纹饰，纹饰通高约3.3米，揭露出来最长约23.2米。

遗址共出土各类文物标本6万余件，质地包括陶、瓷、石、玉、木、骨等，其中绝大部分遗物为各时期的瓷器标本，除此之外，还发现有大量兽骨和人类遗骸。

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宋代石壁代表了北宋时期石



州桥东侧汴河北岸石壁效果图(局部)

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汴河区域的发掘首次完整揭露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使用、兴废等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存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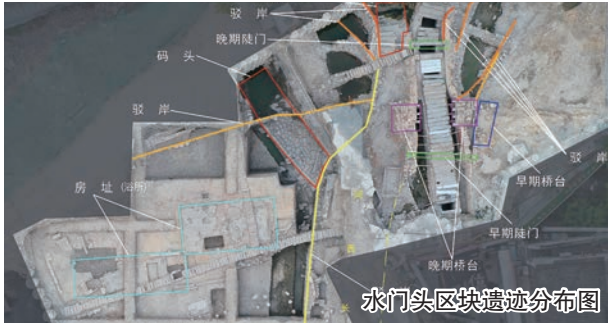
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梁岩华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与世界古航标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约200000平方米。

2021年至2022年，该遗址在基建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发现温州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存，8座码头、1条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并出土沉船2艘、数以10吨计的宋元瓷片以及漆木器、琉璃、砖雕等大量遗物，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以宋元为主。本次发掘，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城市与港口发展的繁华景象和宏阔场景，码头、沉船和海量的商贸类遗物，构成了商港的核心元素，凸显了温州古城港、城一体的规划特色，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发掘揭露的码头遗址群及海量瓷片堆积为温州坐实龙泉窑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丝”重要节点城市地位提供了关键物证。

朔门古港遗址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是



水门头区块遗迹分布图

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填补了海丝申遗体系港口类遗址的关键缺环，被誉为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堪称“国内仅有，世界罕见”，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也是我国海丝申遗工程不可替代的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